

墓葬情境下铭文所见 两周青铜礼器的分类与器用

杨 博

[摘要] 贵族墓葬的随葬青铜礼器器用是了解商周礼制的重要途径。随葬的青铜礼器，在广义上均属遣器，但其在入圻之前仍具有此前情境下的器用功能。单纯的遣器功能之外，由铜器铭文可见，同墓所出整套器物组合原可以有自作器、赠贖物、媵器和分器等多种器用功能。分清同墓所出组合器物各自的来源与不同的器用功能，墓主自作器作为核心组合的器用功能就会凸显。无论是拼凑还是自作，墓葬随葬铜礼器的整体组合体现的是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而核心组合所带有的礼制内涵才是墓主人族群认同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 墓葬；青铜礼器；器用；遣器；分器

一、引言

礼是商周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通过各种仪式和器物加以规范，从而体现不同的等级与秩序，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相关的仪式称为“礼仪”，相关的器物称为“礼器”。青铜礼器是商周时代“礼”物化的重要形式。礼器应用于各种“礼仪”之中，即为“器用”。不同的礼器与礼器组合具有不同的器用功能。如《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记载：“王巡虢守。虢公为王宫于珪，王与之酒泉。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①周天子巡视虢公所守之地，郑伯享王请器，王予鞶鉴，而予虢公爵，爵作为礼器重于鞶鉴，郑伯因而认为周王重虢轻郑，说明礼器起到了区别亲疏贵贱的效应。类似的事例，还见于同书庄公十八年所记虢公、晋侯朝王，王皆赐“玉五穀，马三匹”。同书评价为“非礼”，认为“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②。即言虢公、晋侯地位不同而被赐予相同的礼器和相同的礼器组合，因而是“不合礼”的。

由于特殊的埋藏形式，墓葬成为考古学遗存中为数不多的能够保留下来的、完整的、未被破坏的特定场景。随葬器物及其礼制意义，似可借由这些器物在墓葬中与墓主、葬具等的空间位置关系

作者：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研究员，yangbo@cass.org.cn。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近出两周封国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20VJXT0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出土文物与文献视野下的六博传统游戏研究”（22VJXG00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承朱凤瀚、刘绪与雷兴山三位先生指点，初稿草成后又蒙苏荣誉、许宏、何鸢、贺西林、王睿、张瀚墨诸先生拨冗教示，匿名审稿专家更是提供了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笔者谨致谢忱！

①② 《春秋左传正义》卷9，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3850-3851、3848页，中华书局，2009。

一窥端倪,这种“情境”亦是其他非墓葬类遗迹中难得一见的。^①通过考察墓葬中的铜礼器样式及其铭文风格,推究器用组合的差异,原是分析商周墓葬中礼制系统的有效途径。^②将同墓出土的所有铜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即对铜器组合或铜器群的整体研究也是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研究的重要学术路径。^③不过随着考古发现的日增和认识的进步,如随州叶家山曾侯墓地所见,某位曾侯所作的同批礼器,这些礼器具有明显成组的特性,在金相实验中亦可证明应为同时同人所作^④,但在下葬时,原有组合被打散重置并形成新的组合关系。这样商周贵族随葬的青铜礼器组合即存在“生作”与“死用”的不同情境。又如著名的殷墟妇好墓,学者也注意到其随葬铜礼器的铭文可分为9组,在这种情况下将这些铜礼器视为一个整体,是否可以得出审慎的认知是值得追问的。汤毓赞进而提出殷墟某些墓葬随葬的“成套”青铜器(组合)中存在不同的“批次”(构成)。^⑤这种对组合的“解构”,严志斌认为其不失为对墓葬随葬铜礼器组合研究的一种有益尝试。随葬铜礼器组合的史学意义,在综合分析器类、铭文、来源与组合多方面后再进行整体研究,或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现。^⑥需要说明的是,墓葬以外,窖藏也是商周铜器出土的重要情境。例如,周原遗址就以数量众多的铜器窖藏闻名于世。周原窖藏出土的铜器大都为宗庙祭器,铸造精良,铭文众多,是研究西周礼乐制度的绝佳材料,备受学界关注。^⑦辽宁喀左、四川竹瓦街等地出土的窖藏铜器,笔者亦有小文讨论。^⑧这里重点关注的是单位出土青铜器中的墓葬出土情况,而殷墟时期贵族墓葬的铜器组合问题,前述汤毓赞、严志斌等先生近来已有比较系统的讨论^⑨,故下文拟以两周时期贵族墓葬同墓所出的青铜礼器铭文、组合为基础,探究青铜礼器器用性质的转换问题,以供师友同好批评。

二、单纯的“遣器”

遣器,《仪礼·既夕礼》有:“书遣于策。”郑玄注:“遣,犹送也,谓所当藏物茵以下。”贾公彦疏云:“遣送死者明器之等……策书明器之物。”^⑩《既夕礼》下文又有:“公史自西方东面,命毋哭,主人主妇皆不哭,读遣卒,命哭,灭烛出。”郑玄注:“公史,君之典礼书者。遣者,入圹之物。君使史来读之,成其得礼之正以终也。”^⑪丧礼中随葬入圹的礼器还需有“公史读遣”的仪节。^⑫所谓遣

① 张弛:《社会权力的起源——中国史前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6-7页,文物出版社,2015。

② 黄铭崇:《从考古发现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现象与西周时代礼器制度的类型与阶段》(上)(下),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2(83本4分)、2013(84本1分)。

③ 参见陈梦家:《殷代铜器三篇》,载《考古学报》,1954(1);郭宝均:《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1-3页,文物出版社,1981;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1218-1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④ 郁永彬等:《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M65出土铜器的金相实验研究》,载《江汉考古》,2014(5);郁永彬等:《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M28出土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载《考古》,2018(7)。

⑤ 汤毓赞、唐际根:《“组合”与“构成”:妇好墓出土青铜器背后的人物与社会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编:《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41-50页,科学出版社,2015。汤毓赞认为,不同批次的青铜器风格、铭文往往不相同,同一批次的青铜器不仅风格相同而且铭文也一致。由铭文相同可知,同一批次青铜器可能有相同的作器者。同墓中出现不同批次青铜器的原因可能是制器者不同,或者是作器者不同,此为“多来源”型青铜器。而墓葬若出土多套器物组合,但这些青铜器风格和铭文完全一致,其作器者、制器者应相同,而且作器者可能就是墓主本人,此为“单一来源”型青铜器。参见汤毓赞:《试论殷墟墓葬青铜容器的来源“构成”》,载《考古》,2019(5)。

⑥ 严志斌:《遣器与遣策源起》,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10)。

⑦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5。

⑧ 参见杨博:《喀左器群与殷周兴替时期东北边域族群的铜礼器器用》,载《地域文化研究》,2020(4);杨博:《商周蜀地青铜尊、罍器用相关问题考述》,载《四川文物》,2021(3)。

⑨ 汤毓赞:《殷墟墓葬青铜礼器组合的新思考》,载《江汉考古》,2018(2);汤毓赞:《试论殷墟墓葬青铜容器的来源“构成”》,载《考古》,2019(5);严志斌:《殷墟商墓铜器组合与墓主归属问题》,载《文物》,2022(11)。

⑩⑪ 《仪礼注疏》卷39,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498、2501页,中华书局,2009。

⑫ 李金松校笺:《述学校笺》,169页,中华书局,2014。

器，即墓葬中给墓主随葬的明器。

考古发掘所得的随葬品，呈现的是在丧礼情境结束下的完成式。在此意义上讲，墓中随葬的青铜礼器，均应属于遣器。上文已述，不少随葬礼器在入圻之前还有其他礼仪应用，故这里讨论的是作为丧葬专用礼器的“明器”。《既夕礼》：“陈明器于乘车之西。”^①其后描述了葬日在宗庙举行大遣奠仪式中需要用到的礼器，如苇草制的苞，菅草编的筩，以及陶制的盛放醢、醢的甗，盛放酒醴的甗等等。这些物品加上死者生前用过的器物，如盘、匜等用具，戈、矛等兵器，在葬礼结束后均要放入墓圻。战国晚期的荀子在《礼论》篇中曾专门举出丧礼中使用的一系列器具，即其所云的“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用”等。薄器，杨惊注：“竹苇之器”。按荀子的说法，这些器物的特点是专为葬礼特殊制造，徒有其貌而不具备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功能的。丧礼中使用这些器物的目的是“送死，饰哀也”。^②

两周之际至战国中期的墓葬考古发现中，已出现大量微型或小型的不具备实用功能的青铜明器。如北赵晋侯墓地 M93 棺椁之间放置铜礼器两套，一套实用器 16 件，置于椁室东侧；另一套明器 8 件，集中放置于椁室东侧偏北处。明器组合为：

食器：重环纹鼎一、素面簋一；

酒器：素面爵一、三角纹觶一、斜角云纹尊一、重环纹卣一、云纹扉棱方彝一；

水器：素面盘一。

M102 晋侯夫人墓明器组合为：

食器：鼎一、簋一；

酒器：爵一、觶一、方彝一；

水器：盂一。^③

该组墓所见明器种类鼎簋、爵觶、尊卣等组合，各墓均只出一件，且器类不重复，其组合形式应是仿自西周早期的实用礼器，惟器形特征有别^④，体现出“明器”在造型、装饰和制作等方面的微型和拟古的倾向。^⑤

此类器物以外，由铜器铭文可知西周早期已有专门的遣器。1999 年，张光裕先生曾撰文公布了一组西周早期由否叔所作的 7 件铜器：尊一卣一、爵二觶二觶一。器铭分别为：


否叔献彝，疾不已。为母宗彝则备，用遣母霁（尊、卣）；

否用遣母霁（觶一）；

用遣母霁（觶二）；

用遣（爵）；

遣（觶）。

张光裕先生已经指出，铭文中的“遣”，即《仪礼·既夕礼》中“书遣于策”的“遣”。“霁”字铭文作“”。张先生认为“用遣母霁”有两种解释：一是作为名词，可以理解为否叔母亲的名字；二是读为金文中习见的“霁终”之霁，训为“善”。张先生采用了第二种解释，“用遣母霁”

① 《仪礼注疏》卷 38，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488 页，中华书局，2009。

② 梁启雄：《荀子简释》，268-269 页，中华书局，1983。

③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载《文物》，1995（7）。

④ 刘绪：《晋文化》，160 页，文物出版社，2007。

⑤ 巫鸿：《“明器”的理论和实践——战国时期礼仪美术中的观念化倾向》，载《文物》，2006（6）。

即“母有善终，因以为遣”。否叔为其母所作的这7件铜礼器，主要目的是为了遣送母灵。^① 陈英杰也将“𠄎”释为“𠄎”，读为神灵的“灵”。陈先生认为铭文是说否叔患病一直不能痊愈，他以为是母亲的神灵在作祟，所以为母亲制作了一套礼器。“用遣母灵”就是遣送作祟的母亲的神灵。^② 李学勤、李春桃等先生则将其释为“星”，读为“眚”，训为“灾”；认为铭文大意是否叔认为母亲鬼魂作祟，使自己生病很久，因此作铜器奉献给母亲，以遣送母亲鬼魂作祟所带来的眚灾。^③ 吴镇烽先生将其释作族氏铭文“𠄎”，表示否叔是“𠄎”家族的人氏。^④ 否叔组器器铭的释读与理解虽然还有争论，但正如张先生所言，无论“遣”作何种解释，这组铜器是用来“伴随母亲一起遣送的随葬品”^⑤；是否叔为死去的母亲随葬所用，则是可以肯定的，故应是一组单纯的“遣器”。^⑥

可为此说佐证的，是2006年山西考古研究所在黎城西关楷侯墓地，发掘春秋早期的M7仲考父墓中所得的一组“遣器”。该墓所出M7:39仲考父盘内底铸铭为：

仲考父不禄，季姒耑誓，遣尔盘、匱、壶两、簠两、鼎一，永害福尔后。

仲考父，据同墓地M8所出楷侯宰吹壶铭、楷宰仲考父鼎铭可知，其曾为楷侯宰，名吹，字仲考父。不禄，即“不禄”，夭折之意。《礼记·曲礼下》：“短折曰‘不禄’。”^⑦ 季姒耑誓，耑，即端。季姒，据M8所出楷宰仲考父鼎铭可知，其为仲考父夫人，M8的墓主。永害福尔后，害，严志斌读为“勾”，意为乞也，行请也。^⑧ 后，即指后代子孙。盘铭大意是仲考父早夭，其夫人季姒端正为誓，以盘、匱、壶两、簠两、鼎一随葬，祈求仲考父福佑后世子孙。M7同墓所出青铜礼器，正是横鳞纹鼎1、瓦棱纹簠2、龙纹方壶2、横鳞纹盘1、窃曲纹兽足匜1的组合，与M7:39盘铭所记的器类及数量若合符节。^⑨ 虽然只有盘铸有铭文，但是M7随葬的鼎、簠、壶、盘、匜等应即是盘铭所记的这组遣器。

遣器之外，专为死者随葬铸造的青铜器还包括行器、赴器、从器、走器等，前述吴镇烽、严志斌等先生已有精当的研究。^⑩ 严志斌更是提出，铭文中的遣器，始见于西周早期，晚至春秋晚期，较“赴器”“行器”延续更长时间，可以用“遣器”一名来统称^⑪，笔者以为可从。这里值得再强调的还有“葬器”。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随州义地岗墓地，发掘春秋晚期的M6曾公子弃疾墓。^⑫ 其中随葬的M6:11、M6:13两件曾公子弃疾簠，M6:6曾公子弃疾甗，铭文在器物自名“簠”“甗”前有“𠄎”字，发掘者释为登，读为“升”。黄杰认为此字与楚金文中的“登”字差距很大，而与秦简中的“葬”字非常接近，应释为葬，其说可从。^⑬ 联系同墓所出相关器物铭文：

①⑤ 张光裕：《西周遣器新识——否叔尊铭之启示》，载《雪斋学术论文二集》，163-176、171页，艺文印书馆，2004。

② 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550-551页，线装书局，2008。

③ 李学勤：《论殷墟卜辞的新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李春桃：《否叔诸器铭文释读——兼释甲骨文中的“眚”字》，载《文史》，2019（1）。

④⑥ 吴镇烽：《试论古代青铜器中的随葬品》，载朱凤瀚主编：《青铜器与金文》第5辑，21-46、21-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⑦ 《礼记正义》卷5，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748页，中华书局，2009。

⑧⑩ 严志斌：《遣器与遣策源起》，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10）。

⑨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黎城西关墓地M7、M8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2020（4）。

⑪ 另可参见张闻捷：《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30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杨华：《“大行”与“行器”——关于上古丧葬礼制的一个新考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⑫ 发掘者作“曾公子去疾”，徐在国先生指出“去”字形体与楚文字中常见的“去”字形体明显不一样，当释为“弃”。参见徐在国：《曾公子弃疾铭文补释》，载中国文字学会《中国文字学报》编辑部编：《中国文字学报》第5辑，80-82页，商务印书馆，2014。

⑬ 黄杰：《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去疾墓所出铜器铭文中的“葬”字》，简帛论坛，2012-11-05；鞠焕文：《古文字“葬”字简释》，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华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文字研究》第23辑，46-4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禚健聪：《曾公子弃疾铜器铭文辨读二则》，载《中原文物》，2016（4）。

曾公子弃疾之行鼎（M6：9 鼎）；
曾公子弃疾之葬簠（M6：13 簠）；
曾公子弃疾之葬甗（M6：6 甗）；
曾公子弃疾之行壶（M6：6 壶）；
曾公子弃疾之行缶（M6：5 缶）。^①

一方面，随葬礼器以“葬”为自名，表明其正是专门为逝者铸造的随葬品；另一方面同墓同组器物的自名“行”与“葬”，也直接证明了“行器”与“葬器”的性质一致。^② 这些可统称为“遣器”的青铜礼器，都是特地为葬礼和随葬而作、而用的。

三、“赠赙”的礼器

赠赙是丧礼中以财货助丧的仪节，具体有赙、赠、谡、含等不同名称。《公羊传》隐公元年：“赠者何？丧事有赠，赠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赙，货财曰赙，衣被曰谡。”何休注：“赠犹覆也，赙犹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礼。谡犹遗也，遗是助死之礼。知生者赠赙，知死者赠谡。”^③《公羊传》提到的不同名词分别指称不同的助丧形式，《荀子·大略》更为详细，即“货财曰赙，舆马曰赙，衣服曰谡，玩好曰赠，玉贝曰谡。赙赠所以佐生也；赠谡所以送死也”^④，其意是指赠和谡是送给死者带入地下的物品，赠与赙则赠予死者家属使用；这与《仪礼·既夕礼》所言“知死者赠，知生者赙”的原则基本一致。^⑤《左传》文公五年孔颖达疏引郑玄《箴膏肓》又有：

礼，天子于二王后之丧，含为先，谡次之，赠次之，赙次之。于诸侯，含之，谡之，小君亦如之。于诸侯臣，谡之。诸侯相于，如天子于二王后。于卿大夫，如天子于诸侯。于士，如天子于诸侯臣。^⑥

郑玄提出不同的助丧物有时间顺序，分别在葬礼的不同阶段馈赠：含最先，次为谡，继之为赠与赙。此外，不同的助丧物还与助丧者和死者的身份有关。只有天子吊二王后和诸侯相吊，需要四者俱全。天子吊诸侯、诸侯吊卿大夫都仅有含与谡，无谡；天子吊诸侯臣、诸侯吊士，则仅有谡，无含与谡。这样文献所载区分助丧品的标准有：助丧财货的形式及其归所、次序以及助丧人和死者的身份等级。田天曾将之与《左传》的记载对照，认为“谡”的应用最为广泛。“赠”仅用于周天子对诸侯国的助丧，“赙”仅出现一次，其他助丧财货的记载也十分有限。而战国以来，赙、赠二词经常混用^⑦，成为助丧仪节的主要指称。

据墓葬考古发现来说，赙赠品随葬后，在形制上一般会混同于丧家自备的随葬品（包括墓主自作器与丧主为逝者所作的单纯遣器），无法明确区分，而器物铭文对追索其赙赠的性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妇好墓中至少包括亚弼、亚其、亚启、束泉（或子束）等不属于妇好本人的器物，这应是商代赠赙制度的体现。^⑧ 殷墟晚期至西周初期贵族墓葬经常出现的“一墓多族徽”的现象，即同墓所出青铜器带有多种族氏铭文，如小屯 M18 有 4 种，灵石旌介 M1 有 4 种，甘肃白草坡西周墓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去疾墓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2012（3）。

② 吴镇烽：《试论古代青铜器中的随葬品》，载朱凤瀚主编：《青铜器与金文》第 5 辑，3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③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 1，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4771 页，中华书局，2009。

④ 梁启雄：《荀子简释》，368 页，中华书局，1983。

⑤ 《仪礼注疏》卷 39，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498 页，中华书局，2009。

⑥ 《春秋左传正义》卷 19 上，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4000 页，中华书局，2009。

⑦ 田天：《〈左传〉所见助丧制度小考》，载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 2 辑，5-1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⑧ 曹玮：《西周时期的赠赙制度》，载中国文物学会等编：《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309 页，文物出版社，2003。

M1有10种,叶家山M27有6种等等。据研究这些青铜器就有可能是其他家族来参加丧礼时的赠赆品。^①

两周时期的各诸侯国族墓地中,均可见明确为赠赆的青铜礼器。例如河南平顶山应侯墓地M242无墓中随葬的西周早期柞伯簋^②;作器者柞伯“用作周公宝尊彝”,说明柞伯是周公的儿子,柞国的始封君。应国与柞国都属姬姓,是文王子孙,在西周早期关系密切。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34所出西周中期的叔骨父簋,簋铭“侯休作叔骨父庙”,所记是侯为叔骨父营立宗庙之事,器主叔骨父或为侯之弟,或为侯之子,身份一时难以确定。惟霸国国君都称霸伯,簋铭“侯”应非霸君,叔骨父当亦非霸国贵族,故也不会是M1034的墓主。因此该簋似亦为赠赆之物。^③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西周早期墓IM251中出土有两件形制相近的解,其铭分别为:

乙丑,公仲锡庶贝十朋,庶用作宝尊彝(IM251:8庶解);

乙丑,厝锡贝于公仲,用作宝尊彝(IM251:9厝解)。^④

两篇铭文记载的是同在乙丑这天,公仲分别赐贝给庶、厝两人。厝、庶两人的关系显然很密切:两个人在同一天受到同人的同一性质的赏赐物,在此之后决定为了纪念此事作器,器类均选择了解,且形制、大小、纹饰基本相同,铭文格式也基本一致。赐贝是殷人传统^⑤,IM251的墓主传统认为是周人,故庶或厝似均非墓主。这套兄弟作器则亦是赠赆之物。^⑥天马一曲村晋国墓地另见两人合作一套组合器赠赆的情况。如曲村西周中期墓M6384出土的一套盘、盃,其铭分别为:

家父作宝盃,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M6384:5盃);

晋仲韦父作旅盃,其万年永宝(M6384:15盃)。^⑦

这两件器物即应是当时埋葬墓主人时,晋国贵族韦父与家父兄弟合赠的一套助葬水器。单类或盥洗组合之外,还见有墓中主体器类均为赠赆品的情况。如严志斌已注意到的,湖北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M191曾公求夫人𡗗渔墓,该墓同出的三件列鼎、四件列簋与壶等众多礼器的铭文显示,它们均是唐侯为曾侯、曾侯夫人所作“行器”。^⑧同墓所出20件礼器中只有四件铜鬲可明确为曾夫人𡗗渔自作^⑨,占比仅为20%,而明确为赠赆品的礼器比例却不低于40%。

赠赆的青铜礼器一般会同时制作,所以形制、大小等基本一致,惟铭文会有区别,以显示器物由何人所赠,某些特定情形下,还会出现多人拼凑一组器物的情况。枣庄东江小邾国墓地M2小邾君庆墓所出四件簋大小、形制与纹饰近同,器盖与器身铭文不同,分别为:

鲁西子安母肇作簋,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M2:11器盖);

正叔之士庆𡗗作旅簋,子子孙孙永宝用(M2:11器身)。

① 杨华:《叶家山曾侯墓地所见西周早期丧葬礼制四则》,载《江汉考古》,2013(4);严志斌:《关于殷墟的“族邑”问题与“工坊区模式”》,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10)。当然“一墓多族徽”出现的原因除了赠赆制度以外,亦可能与克商后周人“分殷之器物”有关,下文有进一步的讨论。

② 王龙正等:《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载《文物》,1998(9)。

③ 黄益飞:《大河口西周墓地叔骨父簋铭文所见西周礼制考》,载《中原文物》,2020(5)。

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171—172页,文物出版社,1995。

⑤ 刘源:《商末至西周早期赐贝研究——兼论册命制度的历史渊源》,载《历史研究》,2022(5)。

⑥ 石安瑞(Ondřej Škrabal):《两周金文非叙事性铭辞与社会观念的演变》,94页,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9。

⑦ 邹衡主编:《天马一曲村(1980—1989)》,500—501页,科学出版社,2000。

⑧ 严志斌:《遣器与遣策源起》,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10)。

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载《考古》,2020(7)。

鲁酉子安母肇作簠，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M2：12 器盖）；

鲁宰觥作旅簠，其万年，永宝用（M2：12 器身）。

毕仲弁作为其北善簠，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之（M2：13）。

子皇母作饔簠，其万年眉寿，永宝用之（M2：14）。^①

由铭文可见，这四件簠是由 5 人铸造而后拼凑成组的。发掘者曾提出“是错置还是拼配，不得而知”^②。由于目前所见各种铜器资料中，均无相应的庆觶簠器盖、鲁宰觥簠器盖以及鲁酉子安母簠器身等青铜礼器出现，陈絜联系殷墟小屯 M18 子渔墓的随葬礼器多由他族赠予拼凑的情形，指出这种临时拼配即应与赠赙制度有关。^③ 5 人中有男性三人：庆觶、鲁宰觥与毕仲；女性二人：鲁酉子安母与子皇母。作器者地位似乎鲁宰觥最高，庆觶是士；鲁酉子安母与子皇母均为子姓女子，应属小邾国的姻亲。鲁国在山东，而毕仲弁之毕似应属东土妊姓毕族^④，鲁、毕均与小邾国地域相近，由此可见同姓亲族、姻娅以及地域相接、联系紧密的国族会在主家丧礼中提供赠赙品来助丧的器用情形。

四、原是“媵器”的遣器

赠赙的器物，有部分可能是专为丧礼而作，另有部分原是实用器。作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铜礼器的大宗，媵器则几乎全部为实用礼器。媵，《仪礼·士昏礼》：“媵布席于奥”，郑玄注：“媵，送也。谓女从者也。”^⑤《燕礼》亦有“媵觚于宾”，郑玄亦有注云“媵，送也。”^⑥ 媵器即贵族女子出嫁时用于送嫁的礼器。两周青铜礼器中的媵器，有铭文中带有“媵”字的狭义媵器和铭文中虽无“媵”字，但根据作器者和受器者国别、姓氏关系以及出土地点和组合器物可以判断出的广义媵器。媵器包括“同姓媵”“异姓媵”和“姪娣媵”。^⑦ 作器者可以用 7 种名义为出嫁女子铸造媵器，分别是父母双方、父亲、母亲、兄长、主嫁国、来媵国和宗主国。^⑧ 从出嫁女子人数看，有同时出嫁两人而同器铸铭的，称谓在前的是主嫁的嫡女，居后的是来媵的姬妾。^⑨ 周原扶风康家村出土有著名的函皇父窖藏，其中函皇父作琯奭器相关铭文如下：

函皇父作琯奭盘、盃、尊器鼎簠一具，自豕鼎降十又一，簠八，两鬯两壶。琯奭其万年子子孙永宝用（函皇父盘，《铭图》14523）^⑩；

函皇父作琯奭尊兔鼎，子子孙孙其永宝用（函皇父鼎，《铭图》02111）；

函皇父作周奭匜，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函皇父匜，《铭图》14921）。

据铭文所记，函皇父为琯奭制作的礼器有尊器一具、盥洗器盘盃一套，总数不少于 25 件。^⑪

① 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枣庄市东江周代墓葬发掘报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 4 辑，141—231 页，科学出版社，2011。

② 枣庄市政协台港澳侨民族宗教委员会、枣庄市博物馆编著：《小邾国遗珍》，7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③ 陈絜：《邾国墓地所出毕仲簠与殷墟卜辞中的毕族》，载《文史》，2020（2）。

④ 李零：《读小邾国铜器的铭文——兼论东江墓地的墓主与年代》，载《待兔轩文存·说文卷》，198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陈絜：《邾国墓地所出毕仲簠与殷墟卜辞中的毕族》，载《文史》，2020（2）。

⑤ 《仪礼注疏》卷 5，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085 页，中华书局，2009。

⑥ 《仪礼注疏》卷 14，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198 页，中华书局，2009。

⑦ 陈昭容：《两周婚姻关系中的“媵”与“媵器”——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分与角色研究之二》，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77 本 2 分）。

⑧ 曹兆兰：《从金文看两周婚姻关系》，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1）。

⑨ 刘丽：《两周时期诸侯国婚姻关系研究》，2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⑩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简称《铭图》。

⑪ 函皇父器铭所记器物不少于 25 件，但目前只见到 6 件可认为当时同批所作之同组器物，似可推测同批所作之同组器物，存在着不同用途和流向。

李学勤先生曾联系王仲皇父盃(《铭图》14775)铭文“王仲皇父作尾妘盘、盃,其万年子子孙永宝用”,引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所论作器者即函皇父,认为“珣不能是妘姓”“函氏仍系妘姓,珣妘、尾妘是皇父嫁予珣氏、尾氏的两个女儿”。^①与函皇父器群同出的有函交仲簋(《铭图》05788)和会妘鼎(《铭图》02056)。朱凤瀚先生曾据前者,并联系出土于周原齐家村的珣我父簋(《铭图》05032),指出康家村应是函皇父家族的居地,而齐家村应为珣妘的母亲家珣氏族人所居。^②陈昭容先生由此认为会妘鼎与函皇父作珣妘器同出,似可作“同姓相媵”理解,即郃氏的妘姓女子作为珣氏妘姓女子的同姓陪媵女,一起嫁到康家村的函氏家族。^③无论作何理解,函皇父作珣妘器群作为媵器是没有大的问题的。

一般情况下,为贵族女子出嫁所作的媵器在婚礼送嫁之后,就不会和作器者有很大的关系了。其支配权会转移到出嫁女子或夫家手中。如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西周早期偏晚的M1霸伯墓中出有匿侯旨为其小姑出嫁到霸国制作的尊卣。^④山西绛县横水墓地西周中期偏早的M2158倬伯墓中,随葬的具铭媵器有芮伯作王姊器、芮伯作倬姬以及太保器和鲁侯器等三组:

芮伯拜稽首,敢作王姊卣,其累倬伯万年用享王逆侑(卣铭);
芮伯拜稽首,敢作王姊盘,其累倬伯万年用享王逆侑(盘铭);
芮伯拜稽首,敢作王姊盃,其累倬伯万年用享王逆侑(盃铭);
芮伯作倬姬宝媵簋四(簋铭);
鲁侯作宝尊彝(鼎铭);
太保铸(鬲铭)。

发掘者已注意到,随葬品中的两组芮伯作器均是媵器,其中“芮伯作王姊”卣、盘、盃显然与“芮伯作倬姬”媵簋不是同组器物,但二者年代相近,推测是周穆王的姐姐嫁予倬伯,芮伯作为同姓媵嫁。年代较早的鲁侯鼎和太保鬲,亦可能是同为姬姓的鲁侯和太保家族致送的媵器。^⑤黄益飞指出,天子嫁女,须由同姓诸侯摄行父事,为其女主婚。穆王之姊嫁于倬伯,应该是同姓的芮伯来为其主婚。芮伯摄行父事,并以己女芮姬媵嫁,芮伯作倬姬媵簋的“倬姬”即为王姊媵嫁之女,如此芮伯之女倬姬即是王姊之姪娣媵。^⑥

另一方面,墓葬考古发现中又得见一些所谓“媵器返回作器者墓地”的情况,特别是为本家族女儿所作的媵器,或因出嫁女子被夫家休弃,或丈夫早亡,出嫁女子可能携媵器返回母家;而父母兄弟亡故后,出嫁女子或其夫家也可能以媵器作为赠贖品来吊生送死。这是因为出嫁女子与母家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上文述枣庄东江小邾国墓地M1还出有邾友父鬲四件,其铭为:

①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229-230页,文物出版社,1990。王仲皇父盃,王文昶先生认为是苏州周梅谷仿造的,参见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1)。

② 由于王仲皇父盃铭文疑为伪造,朱凤瀚先生指出,皇父之姓目前似不可确知,参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415、423页,商务印书馆,2022。

③ 陈昭容:《两周婚姻关系中的“媵”与“媵器”——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分与角色研究之二》,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77本2分)。

④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一号墓发掘》,载《考古学报》,2020(2)。

⑤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158发掘简报》,载《考古》,2019(1)。

⑥ 陈昭容:《两周夷夏族群融合中的婚姻关系——以姬姓芮国与媵姓郃氏婚嫁往来为例》,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编:《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94-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由芮伯作王姊诸器的形制看,其年代应稍早于芮伯作倬姬簋,短短数年之间铜器作器风格为何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一现象似乎暗示西周铜器在穆王时期呈现出的新变化或是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的,其发生的确切年代似在穆王初年。参见黄益飞:《天子嫁女与同姓主婚——略论山西绛县横水墓地M2158所出媵器》,载《考古》,2022(5)。

邾友父媵其子胙曹宝鬲，其眉寿，永宝用。^①

由铭文可知，小邾国与胙国是姻亲，这四件鬲是小邾国君邾友父为其出嫁到胙国的女儿所作的媵器，但却随葬在小邾国的墓地。由于墓葬和器物年代均在春秋早期，与胙国被灭的时代相近，此应与胙国灭亡的事件有关。或许邾友父之女尚未出嫁，胙国已然灭亡；当然也可能是在南燕兼并胙国时^②，其女携带媵器逃回母家，甚至仅仅是将这些礼器转移回母国，在其兄弟去世时，将这些媵器随葬在墓中。^③ 曾芬甜曾对“媵器返回作器者墓地”的情况做过一些统计，除邾友父鬲外，还有如绛县横水 M2508 西周墓所出匭番生媵媿簋、曲阜鲁国故城 M202 春秋墓所出鲁伯者父媵孟姬媵盘、安徽寿县蔡侯申墓所出蔡侯申媵大孟姬组器（尊二缶一盘一）等等。由此，河南南阳夏馆铺鄂国墓地 M16、M19 两墓所出四件“鄂侯作孟姬媵壶”（M16：3、4，M19：7、10）^④，亦不排除是春秋早期的姬姓鄂侯为本国女子出嫁所作的媵器。在随孟姬到夫家之后，它们又因为上述的某种原因回到鄂国，最后作为鄂侯或鄂侯夫人的随葬品下葬。^⑤

五、原为“分器”的遣器

“分器”有两种，一种是俘获分器，一种可暂名为大宗分器或遗赠分器。^⑥ 前一种学界一般认为是指周人翦商后，周武王将掳获殷人贵族的大量玉器和青铜礼器分赐给有功之臣。玉器据《逸周书·世俘》记载有“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⑦，具体数目或有讹误，但克商后周人对殷商贵族的宝器进行过掠夺，应该是事实。据传《尚书》中原亦有《分器》篇记载此事，正文惜已失传，唯见《书序》存有“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⑧。《史记·周本纪》应据此也说到武王克殷后，曾“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裴骃集解引郑玄云：“宗彝，宗庙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⑨，即将殷商贵族的宗庙彝器赏赐给随武王伐商有功的人。这种“分器”的情况，在西周初期贵族墓葬中的体现，即是大量多而杂的“族氏铭文”加入墓葬整体器用组合。^⑩ 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和宝鸡石鼓山西周早期墓地出土大量带有殷墟风格，且缀有“族氏铭文”或日名的青铜礼器，就是此类“分器”现象的典型例子。^⑪

此类“分器”，从广义上说是周人克商后对战利品的瓜分。^⑫ 1973 年陕西岐山贺家村 M1 出土

① 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枣庄市东江周代墓葬发掘报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 4 辑，146 页，科学出版社，2011。

② 参见杨博：《北白鹄“大保厘中”器铭与南燕》，载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编：《古文字研究》第 34 辑，242-244 页，中华书局，2022。

③ 袁俊杰：《小邾国媵器随葬于本国贵族墓地原因探析》，载《华夏考古》，2008（2）。

④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馆铺鄂国墓地 M7、M16 发掘简报》《河南南阳夏馆铺鄂国墓地 M19、M20 发掘简报》，均载《江汉考古》，2019（4）。

⑤ 参见曾芬甜：《再议夏馆铺鄂国族姓、时代问题》，载《出土文献》，2022（2）。

⑥ 此承何驽先生教示，笔者谨致谢忱！

⑦ 黄怀信等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卷 4，44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⑧ 《尚书正义》卷 12，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409 页，中华书局，2009。

⑨ 司马迁：《史记》卷 4，126-127 页，中华书局，1982。

⑩ 张天宇：《一墓多族徽与商周分界》，载《江汉考古》，2016（6）。

⑪ 参见黄铭崇：《从考古发现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现象与西周时代礼器制度的类型与阶段》（上）（下），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2（83 本 4 分）、2013（84 本 1 分）；林森：《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所见“分器”现象研究》，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 17 辑，225-231 页，科学出版社，2015；张懋镛：《西周早期铜器墓的分类与族属——兼论“分器”现象》，载苗长虹主编：《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12 辑，1-11 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⑫ 《左传》桓公二年宋国大夫父督以郕国大鼎赂鲁桓公；成公二年齐侯命大夫国佐将灭纪国得到的纪甗赠予晋国；襄公十一年晋侯把郑国送来的半数青铜乐器赏赐给大夫魏绛；襄公十九年鲁襄公用吴寿梦鼎赂晋国大夫荀偃；昭公七年晋侯赠给他治病的子产两件莒国方鼎。这些青铜礼器大都是通过征战、灭国而掠夺而来的，严格意义上讲也属于战利品，即阮元所谓“以小事大而赂以重器者”“以大伐小而取为重器者”。参见阮元：《商周铜器说下篇》，载《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2 页，商务印书馆，1937。

簋、卣的年代在殷墟晚期,而罍和甗则属于二里冈向殷墟早期过渡的形式;甗、簋、卣上又分别有三种不同的“族氏铭文”。^① 根据墓主是周人,林沄先生早已指出这些带有不同“族氏铭文”的青铜器都是周人的战利品。^② 郑州洼刘 ZGW99M1 西周墓的出土器物,亦并非是同一器主同时制作的。除 M1: 7 与 M1: 8 两件同形卣与 M1: 10 尊皆铭有“陆乍父丁宝尊彝”,知其是一组器物外; M1: 1 圆鼎有铭文“翼父丁”, M1: 2 圆鼎有铭文“亚其父乙”, M1: 3 分裆鼎铭“史父辛”, M1: 9 长颈圆腹卣铭文“虺丁父乍宝尊彝”等^③,可以肯定这批铜器是有不同来源拼合起来的随葬组合。然而由于墓葬先已在施工中被破坏,墓主暂不能判定是殷遗民还是周人^④,该墓拼凑的青铜礼器,若作为赠赆品反映的是殷遗民与其他族氏间的姻亲或族亲关系;或其中一些器物当属周人克殷后的“分器”。^⑤

西周早期的墓葬中为何出现拼凑礼器的现象值得留意。笔者曾排比过西周早期石鼓山、竹园沟、白草坡、高家堡到洛阳东郊等西周统治核心区域内贵族墓葬随葬铜礼器组合,与叶家山曾侯、羊子山鄂侯、琉璃河燕侯、被怀疑是管的郑州洼刘等西周封国的随葬组合,以及大河口霸氏、前掌大史氏等地随葬组合,发现周人随葬礼器制度早在西周初期已基本成型。^⑥ 2015 年公布的清华竹书《封许之命》中,记载有成王册命时赠赐吕丁的一套“荐彝”。所谓“荐彝”,是祭祀献神的一套礼器,虽非墓葬中随葬礼器组合,但也是一套祭祀用的礼器。据学界研究,其器物组合可还原为:

食器:鼎、簋、鬲、簠;
酒器:爵、觶、觥、卣、壶、勺、禁;
水器:盘、盂、鉴、盥等。^⑦

将上述组合与前述石鼓山、叶家山等墓葬所出器用组合联系,似可发现其基本组合是比较一致的;具言之,与石鼓山 M4 的随葬礼器组合最为接近。^⑧ 这样周初,周王分封诸侯时赏赐的器物应该是有一定标准的。^⑨ 对照《封许之命》,石鼓山墓葬中随葬殷遗铜器这种特殊现象便有了一个较合理的解释,即族氏铭文器物加入整个器物组合,构成完整的礼器器用组合关系。而由器用区位关系等方面看,墓主本人或宗族自作之器物处于器群、器物组合的核心位置,族氏铭文器物在墓主人的器用组合中,如叶家山 M27 随葬鱼伯彭尊、卣组器、M107 随葬戈父乙尊、卣组器等,起到的是其作为尊、卣等类单纯酒器的器物功能,铭铸在其上的铭文,如“戈父乙”等,是超脱此器用情境的。^⑩

“分殷之器物”之外,另一种“分器”,即遗赠分器,是指同一个人所作的器物被分别埋藏在几

① 笔者曾推测贺家墓地或与姬姓的荣氏存在一定联系,参见杨博:《商周蜀地青铜尊、罍器用相关问题考述》,载《四川文物》,2021(3)。韩巍认为贺家墓地在董家村以南不远,董家窖藏属于裘卫家族,贺家也可能是裘卫家族(旅氏)族人的墓葬;参见韩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114-115、237页,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

②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载《林沄学术文集》,26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由于墓中所出青铜器跨越年代较长,前引黄铭崇、张懋镛等先生认为其应是长年收集的结果,“并非所有器物都是分器时所得”。

③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洼刘村西周早期墓葬(ZGW99M1)发掘简报》,载《文物》,2001(6)。

④ 据简报现场调查恢复的墓葬原貌,其“叠甗相邻”的器用区位特征似与殷遗民有关。参见杨博:《殷墟青铜容礼器的器用组合与区位特征》,载《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0(2)。

⑤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1376-13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⑥ 杨博:《西周初期铜器墓葬礼器组合关系与周人器用制度》,载朱凤瀚主编:《青铜器与金文》第1辑,525-5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⑦ 参见何晓歌:《清华简〈封许之命〉所载赏赐物略考》,载《江汉考古》,2022(4)。

⑧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M4 发掘简报》,载《文物》,2016(1)。

⑨ 有观点认为是以祭祀标准为核心来进行挑选组合器物的,参见付强:《由清华简〈封许之命〉看周初分器的标准》,载陕西历史博物馆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4辑,122-123页,三秦出版社,2017。

⑩ 参见杨博:《西周初期墓葬铜礼器器用区位研究——以随州叶家山为中心》,载《江汉考古》,2020(2)。

座墓葬中。^① 前述叶家山曾侯自作同铭礼器的分散随葬即属此类情况。作器者，如 M65 墓主曾侯谏将一部分自己所作的礼器，如曾侯谏鼎等，分赐给子辈 M28 曾侯、妻子 M2 曾侯夫人，或其他宗族成员如 M3 的墓主使用，两代甚至几代人之间还可能存在着礼器的传承，即铭文所见作器者并非皆为器物的实际使用者。泾阳高家堡墓地，亦出有两件同形“父丁”方鼎，分别见于 M3、M4。朱凤瀚先生曾指出，M4 所出的父癸器承自 M3 墓主人，M1 所出“戈父己”器承自 M4 墓主人。故两件同形方鼎，M4 应亦是得自 M3 墓主人^②，也是铭文器物代际传承的一种体现。

过去罗森先生等提出的西周中晚期“礼制改革”，其重要指标即礼器的体量明显加大及器表装饰的变化，以增加在宗庙祭祀场合使用时的瞻仰性与庄严性。^③ 李峰先生提出，铭文书写揭示出青铜器的运用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其铭文深入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铭文使用的一个重要环境就是家内宴飨，这在铭文和传世的西周诗篇中有很多记载。器物在这些由作器者的家人，也包括亲戚、友人、同僚在内参加的社交场合，乃至宗族内宗教祭祀的场合不断使用。^④ 前述曾侯谏器似亦不能排除在家内宴飨为宗族成员共同使用的可能。叶家山 M27、M28 曾侯方鼎即存在器、盖错置现象。同样的情况也见于 M111 与 M27 的曾侯方鼎。M111：80 盖铭为“曾侯作宝尊彝鼎”，器内壁铭文为“曾侯作宝尊鼎”。与 M27：23 方鼎正好相反，M27：23 盖铭为“曾侯作宝鼎”，器铭“曾侯作宝尊彝鼎”，“侯”字也为反书。此说明这两件方鼎在入葬前已弄混。^⑤ 循此似说明曾侯墓葬的同铭礼器这类实用器，在庙、寝等礼仪情境中被经常使用。在上述实用场合中，或由于某次疏忽，导致方鼎的器、盖错置。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北京琉璃河新发现的 M1901 墓葬中圉簋、伯鱼簋这两件青铜簋的簋身和簋盖也发现有倒置现象。^⑥ 朱凤瀚先生近年根据叔趯父卣、伯猷组器与卫簋及新见宗人鼎、簋等同铭礼器，论证在贵族内部，宗庙祭器有较统一的管理与制造程序。大宗可能控制着整个家族的作器，特别是小宗对祖先的祭祀。西周时期宗法制度在贵族家族内被严格执行，大宗不仅有管理权，有时候还会为小宗作器或赏赐小宗礼器，即所谓“大宗分器”。^⑦

1961 年湖北江陵万城同墓出土有 17 件铜器，其中两件芻簋同形，铭文基本相同^⑧，分别作：

芻作北子柞簋，用饋厥祖父日乙，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铭图》04951）

芻作北柞簋，用饋厥祖父日乙，其万年子子孙孙宝。（《铭图》04952）

李学勤先生曾论定所谓“北子”即别子，也即是支子。^⑨ “祖父日乙”是“祖日乙”与“父日乙”的合称。“芻”为大宗宗子，“柞”为别子，是小宗。^⑩ “用饋厥祖父日乙”的主语当是北子柞而非“芻”，“厥”指代的亦是北子柞，这样的省略和指代关系西周金文多见。因此“厥祖父日乙”是柞的父祖，不一定是“芻”的祖、父。杨坤引虞簋铭“赐厥臣弟”（《铭图》05173）、宗人簋铭

① 张昌平、李雪婷：《叶家山墓地曾国铭文青铜器研究》，载《江汉考古》，2014（1）；任雪莉：《叶家山曾国墓地“分器”现象与墓葬年代另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②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1264-126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③ 杰西卡·罗森：《西周青铜铸造技术革命及其对各地铸造业的影响》，载《祖先与永恒》，48-62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器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载臧振华主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651-676 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曹玮：《从青铜器的演化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载《周秦文化研究》编委会编：《周秦文化研究》，443-456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④ 李峰：《青铜器和金文书体研究》，12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 M111 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2020（2）。

⑥ 李瑞：《北京琉璃河遗址考古取得重大收获》，载《中国文物报》，2021-12-10。

⑦ 朱凤瀚：《金文所见西周贵族家族作器制度》，载《青铜器与金文》第 1 辑，24-4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朱凤瀚：《宗人诸器考——兼及再论西周贵族家族作器制度》，载《青铜器与金文》第 2 辑，16-2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⑧ 李健：《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铜器》，载《考古》，1963（4）。

⑨ 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6）。

⑩ 黄国辉：《江陵“北子”器所见人物关系及宗法史实》，载《历史研究》，2011（2）。

“叔安父作朕叔弟宗人宝簋”(《铭续》30440)等,指出当时已有“弟”的称谓,若羿与柞为兄弟,当称其为“弟”而非“子”。北子柞可能是羿的子侄。羿给柞作器,让其祭祀父、祖,正是同墓所出大宗为小宗作器以督导其祭祀的例子。^①

小宗作器也会自觉遵从大宗。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 M1006 倬伯墓中出有两件倬伯簋和一套仲甸人盘、盃^②,其铭文分别作:

倬伯肇作芮姬宝簋,其用夙夜享于厥宗,用享孝于朕文祖考,用勾百福,其万年永宝,子子孙孙其万年用,夙夜于厥宗用。(M1006: 66、122 倬伯簋,《铭续》30442)^③

仲甸人肇作鬲姬宝盘,其用夙夜享于厥宗,用享孝于朕文祖考,用勾百福,其万年永宝,子子孙孙其万年用,夙夜享孝于厥宗用。(M1006: 20 仲甸人盘,《铭三》41218)^④

仲甸人肇作鬲姬宝盃,其用夙夜享于厥宗,用享孝于朕文祖考,用勾百福,其万年永宝,子子孙孙其万年用,夙夜享孝于厥宗用。(M1006: 21 仲甸人盃,《铭续》30981)

两组铜器同墓出土,年代均在西周中期前段,器主分别是倬伯和仲甸人,铭文均是器主为其妻作器,让其日夜祭祀,子孙永宝。除了人名、器物自名不同(倬伯为芮姬;仲甸人为鬲姬)以及盘盃铭文末句多了“享孝”两个字之外,其余内容全同。倬伯与仲甸人应该有密切关系。墓主倬伯无疑即是倬氏宗子。“仲甸人”之仲为排行,表明其为庶子,因此二者很有可能是兄弟关系。^⑤仲甸人为其妻作祭器模仿宗子倬伯书写,两篇铭文或出自倬氏家族同一书写专家之手。^⑥小宗的仲甸人作器出在大宗的倬伯墓中,这也是大宗在作器方面强大影响力的表现。

若将目光放到整座墓地,叶家山曾侯谏作器的不同流向,似亦可视作大宗“分器”的情况,前述曾侯谏器不能排除在宴飨时被宗族成员共同使用的可能,若由此进一步联想,则宗族成员宴飨使用的曾侯谏器,一方面其铭文确实与器用环境存在疏离的情况;另一方面其又与单纯加入器用组合的外来器物不同,还蕴含着大宗宗子即曾侯,对整个宗族祭祀、作器等诸方面的管理权。大宗管制小宗作器或赏赐小宗礼器,体现出通过规范青铜礼器的器用以强化宗族祭祀、强调尊祖敬宗以增强宗族合力的作器意图,二者结合更是构成了整个西周时期贵族宗族礼制下青铜礼器器用的综合图景。

六、余论

青铜礼器的使用遍见于商周贵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⑦周人重礼,丧祭为重。墓葬青铜礼器的器用自然是了解商周礼制的重要途径。这些在墓葬中共存的青铜礼器,均应属于广义上的遣器。然而我们经常发现同一套器物组合可能包括形制、风格不同的器类;往往也可以见到不同铭文的铜礼器共同在一座墓葬中使用;另一方面相同铭文的器物不仅可以跨越器类,还能够同一墓地甚或不同地区的多座墓葬中出现。这些青铜礼器应该有不同来源,在其最后作为遣器入圻使用之前,还可能是赠赙、媵器甚至是宗庙祭器。^⑧它们共同反映出墓主以及丧家的社会关系甚至是族群文化传统。

①⑤ 杨坤:《两周宗法制度的演变》,187、1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② M1006墓主为一代倬伯,参见谢尧亭:《晋南地区西周墓葬研究》,128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③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简称《铭续》。

④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简称《铭三》。

⑥ 石安瑞(Ondřej Škrabal):《两周金文非叙事性铭辞与社会观念的演变》,134页,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9。

⑦ 《礼记正义》卷61,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3648-3649页,中华书局,2009。

⑧ 若抽离墓葬这个特殊情境,战争、联姻、贿赂以及赠赙等方式都可能是造成青铜礼器器用功能转换的有效途径;参见袁艳玲:《周代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动》,载《考古》,2009(10)。而商周贵族实际生活中使用的青铜礼器,则有祭器、燕器和明器三类,主要用在祭祀、宴飨、丧祭、赏赐、赠赙等礼仪活动中;参见孙明:《论商代青铜礼器的分类与使用》,载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2辑,60-70页,岳麓书社,2016。

以上所作遣器、赠赙、媵器和分器的粗浅分类，着眼点是青铜礼器在入葬之前阶段的使用情况，实际问题可能会更复杂，比如西周早期有些赠赙器不能排除是“分器”所得，也就是说在被赠赙之前，它们仍旧具备在当下阶段的器用功能。另一方面，这个分类不是共时的，若从时代来看，如族氏铭文在周初贵族墓葬中的大量出现，就与周人翦商的行动息息相关；又如媵器在两周之际至春秋时期最为盛行，这与春秋时期婚姻关系几乎成为诸侯国之间最为频繁的外交政治活动这一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这些器物来源与作器意图的演变趋势，其实是和墓葬整体器用组合、青铜器自身发展、演变的轨迹是一致的。

分清同墓所出组合器物各自的来源与不同的器用功能，墓主自作器作为核心组合的器用功能就会凸显。例如殷墟墓葬青铜礼器组合以酒器“觚、爵”为核心，觚爵的套数反映了墓葬等级与社会关系变化。^① 而西周早期周人贵族自作器则以鼎等食器为核心，如叶家山随葬礼器组合中外来器物虽占有相当的比例，但不难注意到，这些青铜器多为酒器之属，鼎、簋等铭有“曾侯”的器物，显然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② 这种器用现象与殷、周礼器器用的二系分途存在关联。^③ 换言之，无论是拼凑还是自作，墓葬随葬铜礼器的整体组合体现的是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而核心组合所具有的礼制内涵才是墓主人族群认同的具体表现。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Usage of Bronze Ritual Vessels from Zhou Tombs Based on Brone Inscriptions

YANG Bo

(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examination of the use of bronze ritual vessels in aristocratic tomb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the Shang and Zhou ritual systems. The bronze ritual vessels used for burial purpose are generally classified as burial artifacts, but they still had the same functions as before after being buried in tombs. In addition to the function as dispatched utensils, the entire set of utensils from the same tomb could have exerted various other functions as self-made utensils, gifts, dowry, and divided treasure. By distinguishing the sources and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he set of artifacts from the same tomb, the function of the tomb owner's self-made artifacts as the core of the set will be highlighted. Whether it is patchwork or self-made product, the overall combination of bronze ritual vessels in tombs reflects the identity of the tomb owner, and the ritual connotation represented in the core combination i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the tomb owner's ethnicity.

Key words: Tombs; Bronze ritual vessels; The use of ritual vessels; Burial artifacts; Divided treasure

(责任编辑 张 静)

① 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器礼器的分期与组合》，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79-102页，文物出版社，1985。

② 张昌平、李雪婷：《叶家山墓地曾国铭文青铜器研究》，载《江汉考古》，2014（1）。

③ 杨博：《周初中原地区贵族墓葬铜礼器器用的二系分途》，载李健胜主编：《西北早期区域史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一届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论文集》，507-518页，三秦出版社，2020。